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诗筑的远离

——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比较研究

THE DEVIATION OF POETIC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Language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Modern
Symbolism poetry

刘永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诗筑的远离

——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比较研究

THE DEVIATION OF POETIC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Language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Modern
Symbolism poetry*

刘永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筑的远离——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比较研究/刘永红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4270-3

I. 诗… II. 刘… III. ①象征主义—诗歌—比较文学—研究—中国、俄罗斯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0402 号

诗筑的远离——中俄象征主义诗歌语言比较研究

©刘永红 著

责任编辑:程牧原 启 颢 责任校对:张 忠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365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4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3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时至今日，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面对这种情势，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便有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形态以及更为迫切的诸般任务。全球化与文化寻根的交错与冲撞，使我们既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那种单极文化的独霸，又必须深思如何遏止盲目自守、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对话与自我更新的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而在形成某种贯通中西、古今的研究视域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吸收和改造外来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以使之成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建设的有机成分，如何有效地将中国文学和文化推向世界以使之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以及如何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来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等等，也都是亟需得到深入研究的课题；就此而言，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某种选择，就不仅要能够针对具体课题以“发之微妙”，而且也应该在此过程中“充之周遍”，以便在疆域、问题和方法等的拓展中获致自身的持续发展。“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酝酿和出版，就是希望能以上述当代学术意识作为贯穿，努力建设一方可供思考和对话的学术平台，旧学新知，赏奇析疑，使相关研讨可以从容、深入地进行下去。

在华中师范大学，聚集着一批挚爱文学、坚持探索和思考的学人。1979年，我校《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率先登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论文。30多年来，我们这个群体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建设一道见证成长。在长期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中，师生们对很多问题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所研讨的范围不仅包括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而且力图立足于中国的文学现实，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生成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话语。这套丛书呈现的是近期研究的部分成果，其中有对我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交流历史的探讨，有对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运用的轨迹的考察，还包括国外中国学研究和海外华裔文学的研究等等，问题探讨虽各有侧重，在比较中寻求学理的贯通与深入则是我们的共同之义。该丛书系列计划将来每年推出 1 至 2 本论著，以求教于同仁。

我们深知，比较文学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似乎构成了对人的智力的挑战，也惟其如此，比较文学才显得更有魅力。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充满激情地说：“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在从事比较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对“人生苦短，学海无涯”这八个字有深深的体会。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之畔。滔滔江水不仅养育了我们，而且给了我们的思考和写作一种豪情，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极目楚天，云蒸霞蔚，我们希望“华大博雅·比较文学研究丛书”成为一座沟通中外的桥梁，八方朋友在这里会聚，大家互相倾听，互相交流，享受思维的快乐，放飞心中的梦想。

胡亚敏

2008 年 2 月

中俄文学的文化内涵分析（代序）

文学，是关乎心灵的事情，是民族思想、民族灵魂、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凝结和反映。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文学之一。俄罗斯文学虽然起步稍晚，却极其辉煌。鲁迅先生说过，“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①。俄罗斯文学对我国 20 世纪文学产生过很大影响。比较中俄文学精神与文化传统，分析中俄两国生存状况、风土人情、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规范等对文学的制约、催化和形象反映，有利于揭示文学影响的依据、方式和效果。

一、中俄文学精神比较

（一）悠久的文学与辉煌的文学

1.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文学之一。从《诗经》算起，它已经历了三千年的岁月，绵延至今。在三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由瑰丽奇幻的上古神话开其端，其后出现了几个有特色的高峰，诗经、楚辞、诸子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积累了丰厚独特的文化遗产。

2. 俄罗斯文学虽然起步稍晚，却极其辉煌。尤其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更是流派纷呈，人物丰富，犹如秋夜的晴空，蓝色的苍穹上缀满星星，耀眼，璀璨，那么多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让我们目不暇接。文学思潮有古典主义、感伤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第 48 页。

等。人物形象长廊中，其类型有多余人、新人、革命者、女性形象等。

曾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俄罗斯的贫穷和落后。这是一种庸见。其实，它是得益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向西方的学习、俄语的成熟、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提升了俄罗斯的国力，唤醒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而专制制度、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压抑激起了进步贵族青年的反叛意识、自由追求和公民意识。这才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我国讲“悲愤出诗人”，个人色彩较浓，俄罗斯文学则充满民族的悲愤与觉醒。

（二）载道的文学与矛盾的文学

1. 中国文学讲求“文以载道”。自先秦儒家把“诗教”视为最主要的政治教化手段以来，文学创作一直以“文以载道”为其社会功效，以德行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

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就需要志士仁人加强仁、智、勇的修养，达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境界。

在古代，《大学》是每个读书人接触的第一本经典，具有发凡启蒙和确定人生宗旨的作用。朱熹把《大学》列为“四书”之首，因为它强调了自我修养的八个步骤，并以天下太平和谐为其终极目标。这八个步骤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文学强调“有益于世道人心”。

言志的人文气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是诗歌。诗歌的社会功效首先是“诗言志”（《尚书·虞书》）。儒家使中国文学形成了重言志、重德性、重人文精神追求的特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2.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却十分特别，且根深蒂固，造就了俄罗斯的圣愚和漂泊者。如民族性格的矛盾、人物的矛盾、作家自

身的矛盾、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只有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文豪才能把握“心灵的辩证法”，将矛盾完美地描绘出来。

俄罗斯文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矛盾的形象。如达吉雅娜的矛盾。她被普希金称为“我的亲爱的理想”。她生活在奶娘和仆人间，爱听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热爱俄罗斯大自然，纯朴，真挚，从不撒娇，忸怩作态，与当时的贵族生活格格不入。她坚守自己的爱，又忠实于自己的选择。她对奥涅金说：“我爱您（又何必隐瞒？）/但是我已嫁了别人/我就永远对他忠诚。”

在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上，陀斯妥耶夫斯基通过笔下的人物崇拜他（《罪与罚》中的拉斯科里尼科夫杀死老太婆后，对索尼娅说：“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我杀了她……”），而托尔斯泰则藐视他：“安德列公爵（受伤躺在地上）看着自己上面遥远、深邃和永恒的天空，他知道，拿破仑，他心目中的英雄，这时显得那么的矮小，那么的微不足道。”（《战争与和平》）

（三）诗化的文学与苦难的文学

1. 中国文学具有诗化品格，体现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中。中国文学具有诗化追求，小说、戏剧也受诗歌的影响。如章回小说中的“诗曰”，“有诗为证”等；《西厢记》等戏剧都是诗体形式，是华美的诗章。

中国文学以善为上，其核心是尚善，以善为美。尚善的理想主义情怀是儒家诗教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孔子评《韶》乐时说：“尽善矣，又尽美也。”评《武》时，则批评说：“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屈原为了理想，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一个集勤劳、坚强、勇敢、坚贞诸美德于一身的典型形象。

中国文学讲究借象寓意，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追求意象、意境的极致。中国文学注重对意境的渲染和营造，追求在文学作品中

构成一种审美意境。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含蓄写意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美学风格。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再如文人赞颂松、竹、梅、菊、荷等。

2. 俄罗斯文学是俄罗斯人生活的记录，重视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冲突。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形象化的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史、兴亡史。俄罗斯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不仅具有地域的和时间的含义，而且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独树一帜的美学意义。

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资源滋长了俄罗斯人的惰性和依赖性。他们在大地母亲那里只要稍稍费点力气就可获得可观的果实，满足起码的生活需求。更何况寒冷的冬季，漫漫长夜、皑皑白雪、阴沉沉的天空，它使人感到肃穆、庄严，一种不可言状的压抑。森严的等级、残酷的剥削又制造了无数的穷人，无尽的苦难造就了无定形的、光怪陆离的、病态又恶毒的俄罗斯灵魂。这些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如《罪与罚》、《猎人笔记》、《木木》、《小公务员之死》、《苦恼》、《万卡》等。涅克拉索夫说：“这里只有石头才不会哭泣。”

战争的苦难却刺激着作家的创作，促进文学的短暂繁荣。可以说，几乎每场战争都会诞生一些著名的作品，如古代的《伊戈尔远征记》、莫尔恰诺夫的《波尔塔瓦》、莱蒙托夫的《波罗金诺》、勃洛克的《库里科沃原野》、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等。他们都试图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对照来解释俄罗斯人的灵魂、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

二、文化传统比较

（一）东正教与“三教合一”

1. 俄罗斯是一个宗教性的民族，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已渗透并扎根于俄罗斯民族的方方面面，诸如哲学、政治、文学、日常生

活以及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其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主体成分。

988年，东正教替代了多神教，成为国教。1453年，拜占廷帝国为土耳其所灭，罗斯很快成为世界东正教中心之一，罗斯人成为上帝的选民，东罗马帝国的当然继承人，号称“第三罗马帝国”，构成“古代罗马—东罗马—俄罗斯第三罗马”脉络，充满狂热的“弥赛亚”^[注]拯救人类的使命感。但多神教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并且和基督教一起刻进了他们的灵魂。教堂、湖边、老橡树旁，都是他们礼拜上帝、冥思众神的地方。

这种宗教情结既表现在宗教文献、哲学、文学艺术中，也表现在民间口头文学、谚语和作家的观念中，如：活着是给上帝做仆人；朋友想到朋友，而上帝想的是众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这里略举几个作家的名句，以见一斑：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大概，俄罗斯民族唯一的爱是基督。”弗兰卡说：“宗教情结穿透了俄罗斯人的心灵。”布尔加科夫说：“俄罗斯应向世界展示它是信教的罗斯。”卡尔萨文说：“俄罗斯文化在其宗教品质中才能理解得更完整。”弗洛罗夫斯基说：“要做一个俄罗斯人，真的，必须是一个东正教徒。”（Воробьев 1997：102）

2. 中华民族的宗教意识相对薄弱些。它“三教合一”，以儒家为主导文化，释、道是其补充。如道教的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所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化基质、社会心理、生活态度、家国观念和审美取向。

儒家重视礼教，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人的宗教可以说都消耗在了祖宗崇拜上。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即“慎终追远”。儒家重视祖宗崇拜和圣贤崇拜，以“天人合一”为基本图式，与政治、伦理紧密结合。

道家以“道”为本体，崇尚自然，崇拜“得道出仙”的历史人

物。它尊重生命，以“长生”为宗旨，神是苍生有形的人。道教虽讲隐遁出世，但有一定的“入世”倾向，隐士们多半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入世。它对中国的游仙文学和田园诗有很大影响。

佛教对中国说唱文学、小说、文学批评，都有很深的影响。《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故事来源、艺术构思、思想倾向等都与佛教有很深的关联。禅宗对中国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如诗人们以禅入诗，王维甚至被称为“诗佛”，苏轼精熟禅理。

（二）救世意识与劝善情怀

1. 俄罗斯文学以其德性特征著称于世。俄罗斯人心中长存着对众生的哀痛，对全世界命运的忧伤，对全球的自我意识。这是一种救世的使命感。在其文学史中，知识分子的救世意识笼罩着其整个精神世界。作家、诗人没有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的。他们决不避开社会的暴风雨，爱祖国，爱人民，富有高度的公民责任感。罗蒙诺索夫的御用文学，拉季舍夫的自由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就是生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生活”，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这些都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面镜子。

2. 在中国，美与善是可以互训的，美即善，善即美。“美”，从“羊”从“大”，指肥大的羊。古人把美与幸福联系在一起。可见，中国人最初的审美意识就渗透着强烈的功利性。《诗经》讲究“诗言志”。有很多作品与时政有关，如针砭时弊，劝诫统治者，歌颂文治武功。《毛诗序》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道学家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通书·文辞》）

中国文学要求文艺具有崇高的社会使命感，反对低级无聊的纯粹感官性愉悦的作品，使文学起到净化人类灵魂的作用。

（三）团契心理与乡土性格

1. 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国家。俄罗斯的文化心态，或称“俄罗斯的逻辑—心理—宇宙”（Русский Лого—Психо—Космос），或“俄罗斯人民智力精神结构”（合聚性个性），就如俄罗斯社会政治结构一样，在近千年的延续中是不断变化的。但主要的观点却积淀下来：社团性（общинность），合聚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东正教信仰（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东正教（православие），专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在任何时候，社会国家利益都高于个人利益。正是在这“人民心理的原始因素”下，已融入语言术语和文学精神的个人自我意识永远无法突破集体的限制。

2. 中华民族是一个稳定的民族，具有稳定的民族性格。这主要表现为一种乡土性。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靠种地为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却不知道“土”是他们的命根子。

对土地的眷恋，既是一种稳定因素，也是一种羁绊。这使中国滋生了浓重的好古气氛、保守习气。中国文学史上几次较大的复古运动就是证明，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讲究“无一字无来处”。

（四）忏悔意识与面子观点

1. 俄罗斯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一般都有强烈的忏悔意识。东正教认为，人是生而有罪的，每个人都无权去裁判别人，他在尘世所做的一切应该是救赎人性的过程。它着眼于对人的天性中的卑劣成分进行反思，而把裁判权交给上帝。这样，人作为人本身，并不纯洁，但却维护了内心的统一。如托尔斯泰的《复活》。

2. 中国人则是讲面子，有一种羞愧意识。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人之所以犯错、犯罪，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本性。罪不在人，而在于他受了外界的诱惑，放弃了自己的本性。所以中国人犯罪后，不是自责，而是将责任推给客观因素，每个人都有权评判和

指证别人。而且，越是苛刻地对待别人，就越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于是，形成了一种他律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只有羞愧、认错和反省，没有深刻的忏悔。这维持了人本身的纯洁性，却放弃了个人的责任，导致了人格的分裂。如林语堂《中国人》中所指出的：“阳性的三位一体：官、绅、富。阴性的三位一体：面、命、恩。”

（五）极端与中庸

1. 俄罗斯人容易走极端。“俄罗斯的精神就在于此，它指向最后的和终极的，指向一切方面的绝对存在，指向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爱。”它“企求一个绝对中的神圣国家，唯有绝对神圣使它迷恋”。因此，俄罗斯人显示出“全有或全无”的生活姿态^①。

俄罗斯文学中，一方面，纯洁的高贵令人感动；另一方面，主人公性格中极度的鄙俗、粗野又让人震惊。

俄罗斯人对一切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满，对定型的事物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圣愚”（юродивый：безумный，божевольный，дурачок，отроду сумасшедший；народ считает юродивых Божьими людьми，находя нередко в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ых поступках их глубокий смысл）朝圣是一种特殊的俄罗斯现象，朝圣者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行走，始终居无定所，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只是追寻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渴望自由。

俄罗斯文学中，自由是一个永远的主题。俄国封建专制制度腐朽，经济落后，战争连年，这唤醒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文学遂成为时代的鼓手。它揭露沙皇政权和教会相勾结的行径，推崇公民精神，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锐气，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农奴制。沙皇俄国的专制、暴政和黑暗使热爱真理、歌颂自由一直成为俄罗斯文

^① 汪剑钊：《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学中长盛不衰的主题。如拉季舍夫的颂诗《自由颂》、雷列耶夫的《公民》、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蒲宁的《致祖国》、勃洛克的《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的《自由的黄昏》等。但俄国农奴制的贫穷和落后、沙皇的棍棒和镇压，与对爱、理想、和平、幸福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矛盾，由此矛盾处境带来的悲伤的情调令人压抑。这些受压抑的心灵需要鼓动。

2. 中国人向往中庸的境界，认为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不走极端，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一切以中间取向为依据，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知足也形成了中国人对幸福、美好、真理追求上的消极态度。反映到文学上，则成就了文学和艺术的“中和之美”的美学传统。如《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只考虑质朴，忽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如果只考虑外表的文采，忽视质朴，就会显得虚浮）

中国文学讲究含蓄，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怨而不怒，婉而多讽。

（六）信奉启示与拘于现实

1. 俄罗斯人不讲究逻辑论证，更多地信奉宗教哲学的启示精神。俄罗斯历史比较短，没有产生过希腊式的理性活动，没有受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的洗礼。

俄罗斯有着特殊的自然—人文背景，虽然出现了罗蒙诺索夫这样的科学天才，但并没有培养起真正的民族理性精神。“俄罗斯的反动，实质上总是对整个文化、整个意识、整个精神东西的敌视，其背后永远站立着某种黑色—自然力的、混沌的、蒙昧的、狂醉的东西。”^① 他们更关注历史的意义、人类的前途、生命的存在、神

^① 汪剑钊：《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与人的关系、世界的命运等问题。这也孕育了俄罗斯文学的辉煌。

2. 中国人推崇直觉,讲究体悟。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思维方式以直观意象为主。用直观、直觉、意象来直接把握对象,如用“太极”表示宇宙,用“顿悟”来把握世界,用阴阳、八卦来分析现象。这使中国文学十分讲究意象、意境。

(七) 普希金在中国

我国也形成了一种“普希金情结”。鲁迅先生说过:“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国文学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和心灵。中国文学在逐步汇入世界文学大潮的过程中,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尤为令人注目。不论是“五四”时期、抗日时期,还是新时期和今天,它都是我们的参照系。许多中国民众、中国作家都是在俄罗斯文学,特别是19世纪文学以及普希金诗歌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

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了普式庚的《俄国情史》(扉页上印有《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括号中注明“一名《花心蝶梦录》”,即《上尉的女儿》)。20世纪末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掀起“普希金热”,1996年4月,中国“普希金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

中国俄语人以获得普希金奖章为专业最高荣誉。因为,普希金精神已融入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血脉,普希金的诗在中国落地生根,始终伴随着中国人的命运而悸动。普希金的诗有着明显的东方品质,既有李白的豪放,又有杜甫的沉郁。中国懂俄语和对俄罗斯文学、文化感兴趣的人远比西方多,中国人已接受了普希金的审美视角和审美惯例。

三、本书框架

中俄象征主义是中俄文学史上一个成就显著而影响深远的文学现象。在俄国,它是现代主义的先声、“白银时期”的文学主流;在我国,早期它与自由诗派、格律派成鼎立之势,其后的戴望舒、九叶诗派更造就过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

全书共五章。

导论部分综述中俄现代象征主义诗语研究的现状和偏向，简述象征诗语的构成方式、结构模式和传达功能，提出比较象征诗语的角度和方法。

第一章从词源学、语义学和诗美学等层次论析“象征”、“象征主义”、“意象”、“诗语”等，以建立本书诗语比较理论框架；分析象征诗派的源与流、共性与个性、传播与接受，中俄象征诗派诗语的特点、得失和影响。

第二章以李金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为线索，对比分析中俄早期象征诗派在象征诗语移植期的探索：灯型诗语与神型诗语及其神秘、朦胧、晦涩、颓废的特征与影响。

第三章以戴望舒和勃留索夫为线索，对比分析中俄象征诗派平衡传统和西方，为情造文，使“镜型诗语与灵型诗语”成为中俄象征诗歌成熟的标志的语言模式和影响。

第四章以九叶诗派和勃洛克为线索，对比分析中俄“智型诗语与理型诗语”的诗学成就及其实践意义。

第五章在符号美学的语用视野中，阐述中俄象征诗语的审美构成、象征诗语形态的筑造原理和“造象”过程，理出象征诗语的筑造方式：寄托、通感（契合、并感）、暗示、变形、戏剧化。

结语认为，作为语言的艺术，诗歌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比较是为了借鉴。中国新诗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诗语的建设仍在趋向成熟的道路上艰难地自塑着，热切需要“他山之石”的催化和启发来加速她的孕育过程。

文学是人学，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民族心灵的灯与镜，是“生活的教科书”，俄罗斯 19 世纪文学就是最好的明证。应该透过文学看文化，透过文化观文学。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比较文学有助于我们连接语言、文学与文

化。愿我们在“语言—文学—文化”的互动和文学比较中学习到底道的外语，为中外文化交流尽一份力。

* 本文曾发表于核心期刊《中国俄语教学》2009年第2期。

[注]“弥赛亚”是犹太教名词，最早源于古希伯来文 Mashiah 一词，意为“救世主”，希腊文为 Christos，英文为 christ，译成“基利斯督”。在俄罗斯人心中，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

参考文献

[1] В. В. Воробье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M], М., изд.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1997.

[2] 鲁迅. 南腔北调集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 林语堂. 中国人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 汪剑钊. 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 [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